

1962年，「诗圣」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认定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以其「转益多师」、承前启后，在中国诗史上被誉为「集大成」，杜诗学与《诗经》学、「选学」、「龙学」、「红学」，并称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五大「显学」。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闻一多先生亦称其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诗史 因革论

李新 刘昊旻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博士基金课题《杜甫诗史因革论》 编号2012S03

李新 刘昊旻 著

杜甫诗史 因革论



河北大学出版社

杜甫诗史因革论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杜甫诗史因革论 / 李新, 刘昊旻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66-0405-7

I. ①杜…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杜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3919号

DUFUSHISHIYINGELUN

封面题字: 韩成武

责任编辑: 杨显硕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 260千字

印张: 15.5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405-7

定价: 38.00元

前言

唐代大诗人杜甫,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史实,其作品被后世誉为“诗史”;并在艺术表现上,“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承前启后,对于前代诗歌经典、名家名作,上起《风》、《骚》、汉乐府,中有魏晋六朝,下及初、盛唐诸贤,皆加以学习承继,被誉为“集大成”,并作为诗学楷模为后辈所效法,“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①,“诗家以少陵为祖”(刘克庄《跋何秀才诗禅方丈》)^②,“学诗者莫不以杜师”(赵蕃《石屏诗集序》)^③,“天下以杜甫为师”(叶适《徐斯远文集序》)^④,下启后世文坛诗学之诸多法门。故以其独树一帜的诗坛成就,和仁义笃诚之人格魅力,最终获得“诗圣”之桂冠,并于1962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认定为中国古代四大“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之一。

在杜甫身后,“到了北宋中叶,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共识”^⑤;“北宋中叶以后,诗坛宗杜之风,盛况空前,诗人几乎无一不学杜甫。因此,整个宋代诗歌的发展,从某些方面来看,直可视为一部杜诗影响史”^⑥。以上诸多因素,均为两宋时期成为杜诗学史上第一个研杜高潮期奠定了基础。宋人治杜,在搜集与编辑杜诗、集注杜诗、杜诗编年、杜诗评点、诗话论杜等方面的著述层出不穷,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有关杜甫与杜诗的“诗圣”说、“诗史”说以及“集大成”说,逐步确立并得以发扬,有宋一代文坛上,“千家注杜”、人人宗杜,蔚然成风,如北宋蔡启所云:“学诗者,非子

① 傅璇琮等:《全宋诗》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页。

②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卷九十九。

③ 宋·戴复古著,金芝山校点:《戴复古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④ 宋·叶适:《水心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版,卷十二。

⑤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78页。

⑥ 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蔡宽夫诗话》)^①南宋陆游亦云:“唐诗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数,惟杜诗注者数家。”(《施司谏注东坡诗序》)^②;而且“宋人喜言杜诗”(《四库全书总目·九家集注杜诗提要》)^③,对于杜诗艺术方面的批评,亦层出不穷,特别是对杜诗的艺术风格、对仗艺术、用典艺术,乃至其艺术渊源、传承受及艺术成就等,均有精妙的评述和独到的见解,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奇观。

时至清代,又迎来了杜诗学史上继两宋所谓“千家注杜”时代之后的第二个研杜高潮期,涌现出了诸如王嗣奭《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黄生《杜诗说》、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新解》、杨伦《杜诗镜铨》、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边连宝《杜律启蒙》等一大批富有学术含量的杜诗注本;其中,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以其分章析句、注释详尽、引证翔实,成为“集大成”的杜诗注本,这也标志着杜诗学一跃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五大“显学”(《诗经》学、《文选》学即“选学”、《文心雕龙》学即“龙”学、杜诗学、《红楼梦》学即“红”学)之一。而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全国杜甫研究会的成立,专题期刊《杜甫研究学刊》的创办,又迎来了杜诗学史上的第三个研杜高潮期,有关杜甫思想、人格、文学观,以及杜诗注释、编年、题材、体裁、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等各类研究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而且这一高潮期跨越新世纪,方兴未艾,也更验证了钱锺书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所说的,“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④,以及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中所论:“(杜甫)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⑤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对杜甫与杜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之继承与创新、即因与革之研究,已出现了一些可观的成果,专著如许总先生的《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蔡振念先生的《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胡可先先生的《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郭国平先生的《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有关杜诗学与杜诗接受的总论性著作,分别

① 宋·蔡启:《蔡宽夫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9页。

② 宋·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06页。

③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1页。

④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

⑤ 闻一多:《唐诗杂论》,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页。

列专章对杜诗在后代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作了较为宏观和概括性的简要阐述,但多从杜诗思想内容角度挖掘其文化学意义,较少从后人对杜诗艺术表现的角度进行探索。

单篇研究论文方面,则有一些偏重就后代诗人对杜诗接受情况进行个案研究的论文,如黄镇林《语不惊人死不休——略论黄庭坚学杜》(载《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杭勇《论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学杜之差异》(载《学术交流》,2009年第8期)、杨胜宽的《南宋杜学片论》(载《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03期)、黄桂凤《“诗史”精神重放光辉——论宋末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载《孝感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这些论文多从杜甫和杜诗在后代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影响力方面作论的文章,并由于各自研究对象的局限,对于后代对杜甫与杜诗传播接受的整体情况,则很少论及。

从上述已有研究成果,可见其对研究对象(杜甫与杜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之继承与创新、因与革),尚缺乏宏、微观相结合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杜诗“集大成”说、杜甫“诗圣”说之发生学和发展研究,尚未深入。

本书拟采用中国古代诗史宏、微观研究相结合,文本细读与原典考察相结合的思路和方法,计划先从原典整理,思想、题材与艺术分析、考辨入手,并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如笔者的《论杜甫弃官之举的先秦儒学精神》(《大家》2010年12月)、《论杜诗的充实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论〈红楼梦〉对于杜诗的接受》(《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论金庸〈神雕侠侣〉对杜诗的接受》(《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等,结合当前学界最新成果,在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到来之际,全面、深入、系统地考镜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思想、题材、艺术等方面的前后因、革,对杜甫与杜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之继承与创新,即因与革,进行系统研究,尚有深入探究之空间,预期填补相关学术领域之空白。本书书名中“诗史”之谓,泛指中国诗歌发展史,并非晚唐孟棣《本事诗》所首论之杜诗“诗史”说,特此说明。

目 录

第一章 杜甫思想因革论	(1)
第一节 杜甫与儒家“独善其身”思想	(1)
第二节 杜甫与孟子“为官养廉”思想	(5)
第三节 杜甫与老子道家政治观	(9)
第四节 杜甫与屈原精神	(13)
第五节 杜甫、李白——农耕与商业文化精神之比较	(18)
第二章 杜诗题材因革论	(29)
第一节 杜甫登楼诗	(29)
第二节 杜甫悯农诗	(33)
第三节 杜甫咏凤凰诗	(38)
第三章 杜诗艺术因革论	(43)
第一节 杜诗与儒家“春秋笔法”	(43)
第二节 杜诗与孟子“充实之为美”美学观	(51)
第三节 杜诗与曹植“新题乐府”	(56)
第四节 杜诗的“曲尽人情”特色	(59)
第五节 杜诗的“以有写无”手法	(67)
第六节 杜诗的多样化对仗艺术	(72)
第四章 杜诗传播接受论(上)	(84)
第一节 宋人学杜概说	(84)
第二节 宋人学杜方式论	(90)
第三节 集句诗与隐括词	(118)

第五章 杜诗传播接受论(下)	(133)
第一节 苏轼与杜诗	(133)
第二节 苏辙与杜诗	(137)
第三节 关汉卿与杜诗	(140)
第四节 曹雪芹与杜诗	(147)
第五节 金庸与杜诗	(152)
第六章 杜诗“集大成”说	(157)
第一节 “集大成”说的产生与定型	(157)
第二节 师法风骚、汉魏六朝	(161)
第三节 厚古贵今,取法同代	(173)
第七章 杜甫“诗圣”说	(180)
第一节 “诗圣”说的产生与定型	(180)
第二节 杜诗艺术成就比较论	(187)
附 录	(197)
附录 1:李新杜诗研究书评	(197)
附录 2:李新杜诗研究商榷	(212)
参考文献	(224)
后 记	(236)

第一章 杜甫思想因革论

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的大诗人杜甫，不仅对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加以尊奉，并且通过亲身行动加以履践，特别是“独善其身”思想、孟子“为官养廉”思想以及农耕文化思想等；同时，他还对老子的道家政治观、屈原精神等先秦思想典范有所承袭，皆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做到了“文如其人”。

第一节 杜甫与儒家“独善其身”思想

乾元元年(768)肃宗大肆排挤玄宗旧臣，将贾至、房琯、严武等人先后贬至外郡；杜甫因曾疏救房琯，亦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到任后仅一年，便弃官而去，远赴秦州。究其原因，实非《旧唐书》本传所谓“关辅乱离，谷食踊贵”^①，而是杜甫对昏庸无道的肃宗彻底失望所致。因为司功参军官职虽小，断不至于缺食少粮，况华州地处“京邑”，仅靠俸禄便足可免于饥荒的；而一旦弃官而去，那全家的衣食才是真正不能得到保障的。而正是因为杜甫出于对社稷之忧，才不惜触怒肃宗疏救房琯，不想却被列入打击之列，忠而被贬；加之亲眼目睹肃宗昏庸，一味听信皇后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之谗言，在攻打邠城的九节度军中不设主帅，致使贻误战机，全军溃败，其后抓丁拉夫，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他后来在诗中所批判的那样——“邠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所以才对肃宗失去信心，决然弃官而去。

而在杜甫弃官之举的背后，也体现出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即独善其身的思想。

^①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众所周知,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常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腐儒”;而他所结交的房琯、苏源明、严武等也俱是儒臣;在他头脑中儒家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其诗篇之中也屡有体现。宋人王得臣曾说:“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含今,无有端涯。”(《增注杜工部集序》)^①“周情孔思”,即道出了杜甫诗中所蕴含和体现出的以周公、孔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②

先秦儒家虽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但当其学说行不通或己身为君王所弃,而不能建功立业之时,也会产生辞官退隐、明哲保身的思想,亦即独善其身思想;当然,这和道家从始至终都主张出世隐遁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先秦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多次阐述该思想,如在《论语·泰伯》中有言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即用世与否,视天下有道无道而定,若无道,则退隐而不再参与政事,也就是要独善其身。还有“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等,亦讲邦国无道时,则以出来作官为耻,应当收藏起自身的智慧和才能,守拙而退隐。其他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贤者辟世”(《论语·宪问》)等,也都表示当自己的主张不能被推行,不见用于君时,便当怀贤以退,避世而隐,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学说中的独善其身的思想。

孟子也是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儒学创始人孔子那里的。孟子曾称“乃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并且最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③可见他的思想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其独善其身思想也承袭自孔子;他更加鲜明地阐述了“治则进,乱则退”(《孟子·万章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的独善其身思想,提出: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① 宋·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版,传序碑铭。

② 李新:《孟子“为官养廉”思想对杜甫的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第44页。

③ 王利器:《史记注释》,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5页。

指出“士”在得志显达时,要恩泽天下,而当仕途不顺、功业难成时,则“穷不失义”,仍要“修身”,独守善道,完整的阐述了先秦儒学的独善其身思想。

杜甫曾在《进〈雕赋〉表》中自言家世:“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①他对于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思想多有继承,其中就包含了独善其身思想,并在其弃官远赴秦州的行为中集中体现出来,这也可以从杜甫秦州时期的大量诗歌创作中找到答案。

杜甫在赴秦州前的《立秋后题》诗中,表达了欲弃官远赴秦州归隐的决心:“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在此处的“罢官”,即指弃官而言,“罢官”一词实具两种含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一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的离职是他因事而自动弃官的”^②;且诗中暗用东晋陶渊明语:“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辞》),也表示要效法陶渊明,弃官而隐居。并在到达秦州后所作的《秦州杂诗二十首》的末章中,曲折地表明了弃官的原因——“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首二句先声夺人,以“野老”和“唐尧”相对,用反语讽刺了肃宗的刚愎自用、不纳忠谏,后几句则讲自己以有妻儿相伴而隐居秦州为足,正如先秦儒家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从行动上表现出诗人对肃宗朝廷的无望,和欲弃绝肃宗退隐边地的决心。

而在《佳人》这首寓言式的诗中,杜甫则借诗中身处乱世,又被夫婿抛弃,幽居空谷的佳人形象,以男女君臣相喻,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正寓含了自己不遇于肃宗、忠而被贬的遭遇;而最末两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只用写景,不更着议论,而清洁贞正意,自隐然言外”^③,以坚贞不屈、独倚修竹的佳人形象作结,隐喻自己不肯对昏庸的肃宗苟且屈服,终将怀贤守节以退,独善其身的志向。

并且在杜甫秦州诗中,怀才不遇而即时归隐的古人形象也频频出现,比较集中的要数《遣兴五首》了,其一曰: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陇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

①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72页。

② 韩成武:《也说“罢官”与“弃官”》,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49页。

③ 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页。

将三国时期的贤才嵇康和诸葛亮的不同遭际做对比,言嵇康不得好死,是因为不遇于当政者司马昭,而孔明则因遇到知音名主刘备,方得大展才华;如《杜诗镜铨》所谓,“此章言士不遇知己,则不得展舒其抱负,为下四首发端”^①,托古讽今,借古人而自况,喻自身之不遇于肃宗。下四首则分叙庞德公归隐鹿门山,陶渊明避俗辞官,贺知章辞官还乡,孟浩然终生隐居等古代和当世贤士怀才不遇、退隐山野的事迹,借以明志,欲效法四位先人“贤者辟世”(《论语·宪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独善其身,避世而隐。而《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则写杜甫出城寻故友赞公,欲择地隐居之事,也表明了诗人要将归隐的理想付诸实施的决心。

还有在秦州所作的咏物诗中,也同样体现了杜甫的独善其身思想,其《兼葭》诗曰:

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带雪,几处叶沉波。

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

境界苍凉凄冷,如仇注所谓:“兼葭,伤贤人之失志者”;诗人托芦苇而自况,“末二句,隐然有自伤意”^②;怀贤不遇、忠而被贬的身世之感,寄寓其中;“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正当“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怀贤以退,独善其身。还有《苦竹》一诗,借咏苦竹以赞美君子的避世节操:

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

轩墀曾不重,减伐欲无辞。幸近幽人屋,爽根结在兹。

亦如《杜诗镜铨》所注:“此嘉君子之苦节者。……此章‘亦自守’,见保身之哲。……中四句言世已见弃,末欲以隐居全晚节也。”^③这两首咏物诗均系托物自况,寄托着诗人不遇于君、忠而被贬的身世之慨,以及“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

① 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②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3页。

③ 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29页。

心上》),欲弃世归隐之志。

综上所述,有着“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①之称的大诗人杜甫,在秦州的诗歌创作中,以用典、寓言、怀古、咏物等多种方式,表达了弃决肃宗,辞官退隐的决心,并付诸行动,反映出了诗人所继承的先秦儒学的独善其身思想;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也对儒家独善其身思想强调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主张,有所突破,在秦州时期创作出了如“邕中事反覆,死人积如丘”(《遣兴三首》其二)、“那堪往来戎,恨解邕城围”(《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一)、“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即事》)等一系列忧心天下、关注时局的优秀作品,可谓“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也正是对这种独善其身而又心系天下、不忘苍生精神的坚守,才使得杜甫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第二节 杜甫与孟子“为官养廉”思想

如前所述,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宋人王得臣曾说:“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含今,无有端涯。”(《增补杜工部集序》)^②“周情孔思”,即道出了杜诗中所体现出的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实际上,对于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的思想,杜甫更是加以吸收和继承了的,特别是继承了其“为官养廉”的思想,并在大量诗篇中加以表现。本文试分析孟子的“为官养廉”思想和杜诗中所表现出的廉政思想,来探讨孟子这一思想对杜甫的影响。

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基于儒家“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核心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学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十分重视平民百姓的疾苦;因而他对于百姓的统治者——官,便提出了“养廉”的要求,只有为民父母的官吏能够廉洁为民,百姓才能得以安居乐业,国家的社稷也才能够安稳。这种“为官养廉”的思想贯穿于《孟子》一书的始终,也成为孟子“民本”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例如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就指出,“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民于有制”。

① 傅璇琮等:《全宋诗》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页。

② 宋·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版,传序碑铭。

并引用阳虎的“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之言，指出在位者施行仁政就不能只顾个人的贪图富贵、享乐；否则，“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有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百姓的父母官，却不能使他们供养父母，那又怎能“为民父母呢”？从正反两面阐述了其为官应养廉，而布仁政与民的思想。

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从富民安民的具体措施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要节用，施行廉政，并强调了“为官养廉”的好处在于——“民可使富”，“财不胜用”。还有在《孟子·梁惠王下》中，他告诫邹穆公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以事实讽诫穆公，指出造成百姓如此惨状，其罪全在于“仓廩实，府库充”的当政者不关心百姓疾苦，并引用曾子的话“戒之，戒之！出乎而者，反乎而者也”，警告邹穆公小心百姓们以怨报怨；正如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所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如果当政者只顾贪图富贵，不知节俭，不能养廉的话，那结果必然是“殃必及身”。

最集中表现孟子“为官养廉”思想的是《孟子·梁惠王上》中对梁惠王所讲的一段话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当面直刺梁惠王只顾个人享乐，却使百姓活活饿死——“野有饿殍”，充满了愤激的情感力量。而杜甫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直承孟子这里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言论和思想，用短短十个字，把封建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与对立浓缩其间，一针见血地揭露出那个时代的黑暗！还有孟子所说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则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以犀利的言语和层层深入的气势，讽刺了惠王“为民父母”却不能尽责的罪过，从而阐述了他的“为官养廉”思想，从反面说明只有作百姓父母官的当政者节用、施行廉政，才能养民富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以此实现“王道”。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为官养廉”思想也系承袭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在《论语》中，孔子的多处言论都反映出他那种重节俭，行廉政的思想。例如对于“礼”的问题，孔子就曾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的主张；对于富贵，则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虽然肯定了求富

贵是人的本性,但若有违仁义的话,宁可不要。这就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摒弃了力求富贵而不顾他人包括百姓利益的可能性。儒家讲“修齐治平”,注重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以备今后政治上实行仁政与王道,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所以注重自身修养中尚节俭这一点,也是为从政后施行廉正作准备。

因而,当学生子张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时,孔子提出了“尊五美”的观点,即要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其中的“惠而不费”和“欲而不贪”,即讲要给百姓以好处,而当政者自己则要避免奢侈浪费,贪图富贵;这就属于“为官养廉”。还有他提出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主张中,也强调了要节用,施行廉政,从而减轻百姓的负担。

而且,当孔门的弟子对此有所违背时,孔子是非常生气的。如《论语·先进》中所讲,“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弟子冉求为富比周公的季氏聚敛搜刮,必然损害百姓的利益,有违仁义,与孔子节用、爱民的思想恰恰相悖,所以孔子才会勃然大怒,不再承认冉求为弟子,并让其他的门徒大张旗鼓加以讨伐。从这里也可看出,孔子的节用、施行廉正的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

联系前文,可以看到,孟子的“为官养廉”思想也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

杜甫曾在《进〈雕赋〉表》中自言家世:“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①并且一生“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因而他对于儒家代表人物孔孟特别是孟子的思想也是加以继承的,其中就包含了“为官养廉”思想。这可以从杜甫诗中大量表现其廉政思想的篇章中找到答案。

杜甫早在困居长安时期,即已形成了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并创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等大量具有批判现实精神的诗篇;而他所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深刻地揭露了天宝后期玄宗君臣的腐化堕落,也从中体现了诗人的廉政思想。开篇即自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正是基于此,诗人才对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奢侈腐化作了无情地揭露,“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指出统治者的挥霍无度,正是建立在对平民百姓的压迫、剥削基础之上的;也正是由于他们不知节俭,不行廉政,才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朱门酒肉臭,路

①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72页。

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因而“仁者宜战栗”。而像诗人“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这样的家庭，犹不免于幼子饿死的境遇，更何况是那些贫民百姓了。而在诗人后半生的漂泊流离岁月中，他仍不断对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加以揭露，并对搜剥百姓，不行廉政的贪官污吏给予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如《驱竖子摘苍耳》一诗，“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指出正视当权者的诛求盘剥，才使百姓连粗糠都不够吃，以致造成了“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的残酷现实。所以诗人在篇末对那些纨绔子弟予以讽刺，“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

另外，杜甫在诗中也曾用寓言体的形式来讽刺和揭露那些不行廉政，只顾剥削残害百姓的当权者，如《麀》这首诗，“永与清溪别，蒙将玉饌俱。无才逐仙隐，不敢恨庖厨。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代麀而言，揭露了那些兼作盗贼的衣冠人物鱼肉百姓的丑恶本性，并把他们喻为贪食的恶兽——“饕餮”，直如呼作“衣冠禽兽”一般，真可谓入木三分。

并且，杜甫往往在诗中直接评述政治时局，提出倡俭德、行廉政以治国安邦之策。如“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娱同”（《往在》），“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等，点明了行廉政的好处和必要性。而《提封》一诗：“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义入，草窃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则指出与其恃险守土，“何如俭德临？”表明安史之乱实由玄宗君臣好边功而尚奢侈所致，即所谓“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铤》），所以要“恩加四海深”。正像孟子所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只有行俭德，施行廉政，推恩四海，才能实现“提封”，即一统。全诗为国谋划，堂堂正正，一如孟子告梁、齐之君。

不仅如此，诗人还常常在送朋友赴任时，作诗忠告他们要为官廉洁，勤政为民，通过赠诗以实现他行廉政的主张。如在路使君上任时叮嘱道：“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可谓情真意切，为民为公。而更典型的则是《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操持纪纲地，喜见朱丝直。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蠹贼……”录事参军是有操持纪纲、纠弹贪污职能的官职，因而杜甫诗中希望韦讽能像朱丝一样正直无私，尽职尽责，以救苍生；这些诗句言辞恳切，情感激荡，真是“告诫友朋，若训子弟”（《杜诗胥钞》）。

杜甫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这样重视与同情百姓疾苦的思

想,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吴乔说得好,“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并指出杜甫的为人,是“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围炉诗话》卷四)加上其性格中又有“嫉恶怀刚肠”(《壮游》),“嫉恶信如仇”(《除草》)的一面,因而才能在诗中真正地同情百姓的遭遇,为民请愿,并对贪得无厌,不行廉政的贪官污吏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由上可以看出,杜甫的廉政思想其精神实质,是根源于孟子的“为官养廉”思想的;所以,宋人黄彻《碧溪诗话》云:“《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①正是这样,杜甫才把孟子“为官养廉”的思想真正地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从而成为“诗中的孟子”。

第三节 杜甫与老子道家政治观

如前所述,虽然儒家思想在杜甫头脑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然而,在思想文化极度开放自由的唐代社会,仅仅固守一家思想者是不多的。正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所云:“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单独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响的。他们大多儒释道的思想都有,只是成分多少,或隐或显的问题。”^②生活在盛唐时代的杜甫亦不例外,他也曾在诗中不只一次地述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甚至曾发出过“壮士耻为儒”(《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的慨叹,足见他并没有在思想上“独尊儒术”;唐王朝奉道教为国教,道教和道家思想亦得以广泛流传,杜甫也曾对道家创始人老子表达景仰之情——“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而通过对杜甫具体诗歌创作实践的调查,可以发现,他对于老子的思想,尤其是其政治观,也是多有继

① 宋·黄彻:《碧溪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页。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08页。